

美生批评：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一种尝试

Living-Beauty Criticism: An Attempt at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logical Criticism

杨东, 广州理工学院

摘要

生态批评是 20 世纪末形成于西方的批评理论，很快成为全球性的文学艺术思潮，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在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之后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袁鼎生教授则将美生批评视为美生机理之一，纳入了他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与西方生态批评所代表着的西方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不同，美生批评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试图以审美生态观来突破西方生态批评在理论基础和审美特性两方面的局限。美生批评以生态中和为最高标准，追求审美与生态的同运，是生态世界演化为天籁美生世界的重要阶段。

Abstract

Ecological criticism, a critical theory that emerged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quickly became a global trend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After two decades of development, Chinese ecological criticism has also gained widespread influence. Professor Yuan Dingsheng regards Living-Beauty Criticism as one of the mechanisms of living-beauty, incorporating it into his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Unlike the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modes of thinking represented by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Living-Beauty Criticism is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t attempts to use an ecoaesthetic perspective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terms of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With ecological moderation as its highest standard and pursuing the concurrent operation of aesthetics and ecology, Living-Beauty Criticism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world into the natural symphony world of living-beauty.

关键词：美生批评；生态批评；审美生态观；生态中和

Keywords: Living-Beauty Criticism; Ecological Criticism; Ecoaesthetic View; Ecological Moderation

一、前言

二十余年前,司空草(1999)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摘述了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历史》1999年夏季号中一系列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将这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在这之后,随着生态美学逐渐兴起,生态批评很快获得了影响力。王诺(2002)以论文《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介绍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情况、主要成果和思想根源,为国内生态批评打下了信标。直到现在,这篇论文仍然是国内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中国生态批评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并在王诺、曾繁仁等学者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当兴旺的态势。王莉娜和侯怡(2020)认为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生态批评“业已形成了具有中国独特内涵的中国学派”,并将其细分为“生态批评的中国理论建构派、欧美生态批评理论的中国阐释和译介派,以及文学文本阐释派”。所谓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早在近十年前就为王宁和袁鼎生提及。王宁(2009)在《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中预言说,随着中西学界交流的增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态批评中国学派一定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袁鼎生(2013)则在《生态批评的中国机理》里把中国学派当做既有的事实,认为中西方生态批评的平等比较表现出“中国学派对平行研究的深化与生态人文化,是中国学派消化吸收美国学派后的再创新。”袁鼎生是生态批评中国学派中研究较为深入的一位,2009年曾与龚丽娟合著《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21年,袁鼎生在《美生学:生态美学元理论》中总结了自身的生态批评思想,提出美生批评是生态批评的转型升级,并为美生批评设立专节来系统阐述。作为形成于审美生态观基础上的生态批评理论,袁鼎生的美生批评论对于当代生态批评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本文即结合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对袁鼎生美生批评论作一简单介绍。

二、生态批评与西方思维

生态批评形成于二十世纪末的西方世界。刘蓓在《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中说:“生态批评是一种具有强烈西方色彩的当代文化批评,它在西方后现代文化批判的背景下产生,以西方环境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当代生态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为理论依据,以美英环境文学作品为文本基础,采取了西方学者特有的细读方法。”刘蓓所论及的是初创期的西方生态批评,强调了它具有的西方意味。它在西方的土壤上生成,也服务于西方世界的局势,代表着西方的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和思维方式,因此刘蓓说:“对这种西方特色的研究,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刘蓓,2005)。

尽管生态批评以生态为名,但很难说西方生态意识的形成与生态批评有多大关系。从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开始,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迅速席卷西方。从理论上说,这是西方生态批评最适合发挥力量的时期,但它并没有出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各种环境保护机构、团体的建立,相关法律法规的实行,西方环保工作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972年6月,各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次年我国对英国进行境外环境考察时发现,“曾经鱼虾绝迹的泰晤士河已有鱼儿在漫游,而欧洲最大工业中心之一的谢菲尔德市竟没有一个冒黑烟的烟囱。”(郇庆治,2021,p.152)很显然,这些生态治理工作与西方生态批评也基本没有关系,这些成就主要来自政府的行政手段以及民众保护环境的努力。劳伦斯·布伊尔认为约瑟夫·密克出版于1972年的《幸存的喜剧》是“美国生态批评严格意义上的发端之作”(劳伦斯·布伊尔,2010,p.19),但这本著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生态意识,恐怕是值得怀疑的。1978年,威廉·鲁克特在《衣阿华州评论》“冬季号”的《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一文中用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来表示生态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1989年,格罗特费尔蒂在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会议上倡导使用“生态批评”来代替自然写作研究的说法。对“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来说,这些都是标志性的事件,但“生态批评”的真正建立要到20世纪末。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生态批评开始在学术界形成影响力。而它得以初步形成理论框架、构建理论空间,则要从格罗特费尔蒂和哈罗德·弗罗姆在1996年编辑第一本生态批评研究资料汇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算起。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的生态危机已经不像20世纪中期那样触目惊心。

即使生态批评的影响扩大以后,西方生态批评家们对生态保护实践的热情也是有限的。著名的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放弃了直接参与保护行动,只希望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激发自

己的学生“成为更有思想、更有参与意识的公民”，认为这是一种以教学来行动的社会行动主义（斯科特·斯洛维克，2010，p.254）。他们所在意的是以生态为视角进行文化和思想研究。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中首次提出深层生态学，他说：“深层生态学运动力图探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经济行为的以价值观、哲学和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基本假设。”（杨通进，2007，p.124）这一理论常常被生态批评者用来“在具体文本的解读中深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哲学依据”（刘蓓，2008）。而不把生态现状与经济、社会和文化面貌联系起来，深层生态学所希望探明的“基本假设”也就只能是个空洞的假设。一方面，西方生态批评者们在探讨这些假设时，其本身必然是有立场、有偏向的。如果他们只是试图分析本国、本文化的“基本假设”，或许还能基本尊重事实，但当他们的视野转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时，难免会因为刻意筛选的信息、固化的思维模式、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沾染上“东方主义”色彩。如果缺少对第三世界国家具体国情的分析，就可能发生以下情况：与其说在阐释东方传统文化、汲取东方智慧的营养或为第三世界国家指明道路，不如说相当粗暴地歪曲了历史或无视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另一方面，就当前的世界生态局势来看，发达国家的生态保护情况优于弱国、穷国，但这恰恰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哲学和宗教”更加贴合生态需要，而是因为掌控着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利用他们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后者出于经济利益不得不接受这种转移，也就被迫承担了发达国家的生态成本。西方生态批评者如果不能猛烈猛击欧美国家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的做法，那么他们声称要通过生态批评来进行思想或文化批判就只能是一种呓语。

除了环境因素以外，真正促使西方学者们关注生态批评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自然景观来重新塑造国家形象、帮助民众塑造国家身份。在生态批评出现之前，美国就已经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本国的自然写作研究，生态批评只不过是自然写作研究的“改头换面”。所谓自然写作，从字面上看，指以自然为主题进行写作。但程虹在论及美国自然文学时引用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在《处女地》中的一段话：“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程虹表示，十九世纪时，美国的画家和作家们“携手展示出一道迷人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形成了一种基于旷野来共创新大陆文化的独特时尚和氛围”，这就是美国自然文学生长的土壤（程虹，2000，pp.1-5）。换句话说，美国自然写作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与国家意识有密切联系。美国人以新大陆粗犷辽阔的“荒野”来对抗英国/欧洲传统中的规则、温和“田园”观念，确证自己的国家身份。

英国生态批评学者贝特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称华兹华斯为英国第一个真正的生态诗人，布伊尔写出了生态批评领域的名著《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与美国文化的形成》，其研究对象是被称为“绿色圣徒”的梭罗。很显然，华兹华斯和梭罗都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没有什么关系——在他们去世半个多世纪后，英国生态学家亚瑟·乔治·坦斯利才在1936年提出“生态系统”的概念。而在华兹华斯眼里，大自然是上帝在世间留下的神圣碎片，自然在湖畔诗人的心目中充满神秘，是神性的寄托。梭罗与美国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关系密切，孙霄（2013）指出，“基督教文化奠定了《瓦尔登湖》的基本精神结构与话语系统”，“无论如何，梭罗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他又不是一个教会意义上的基督徒”，并沿用布拉德利·P·迪安的说法，称梭罗的作品是其在“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

西方生态批评所面对的是欧美国家的特殊国情，融入的是西方学者对解决本国、本民族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呈现出生态意识与政治目的、国家意识、宗教情怀等等互相交缠的状态，而这些融入到生态批评中的意识形态内容未必就放之四海而皆准。很显然，美国生态批评中的荒野情结无法也无需照搬到中国生态批评之中，西方以宗教情怀为基底，将生态伦理建立在生命的“内在价值”上，也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不符，中国生态批评必须走出一条新路。

三、中国文化语境与美生批评的形成

在袁鼎生看来，中国生态批评是在西风吹拂之后形成的：“上世纪末，生态批评作为文学艺术的绿色批评，兴起于北美，很快成为全球性的文学艺术思潮，构成了文学艺术新的研究气象。”（袁鼎生，2010）《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一书出版后不久，中国学者迅速将其推介到国内。世纪之交时，国内生态问题已经非常突出，这股从西方刮来的生态批评之风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反应。

中国确乎有发展生态批评的条件。首先,中国生态批评所面对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袁鼎生说:“垦荒种粮、围湖造田、大炼钢铁、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国外境外以及国内东部高污染产业转移,全球生态灾变的循环,凡此等等,生发了天人对立的生态关系,直接造成了国人及其所处自然的生态危机。”(袁鼎生,2013)除了生产、生活压力下导致的有违自然规律的行为之外,还应该注意,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通过殖民掠夺等手段完成了早期积累,如今能够依靠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通过高附加值的产业获取高额利润,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则不得不靠资源密集型产业、中低端产业来维持生存。相比之下,后发展国家反而承担了更大的生态压力。其次,中国生态批评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获得了大量理论资源。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农业立国,农业在生产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由此形成了对自然的敬畏与亲和态度。中国哲学、文学中多表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艺术中形成了怡情山水的审美兴趣,都是这种经济结构的直接反映。袁鼎生(2013)认为,中国的生态审美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牢,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态文明,“既成为中国生态批评生发的丰沃土壤,又成为它与西方生态批评进行对话的学理支撑。”再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中国生态批评往往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色调,具有与西方生态批评所不同的角度和理念。袁鼎生认为生态批评遵循生态美学的规律为生态美学的应用研究,他说:“中国的生态批评,依据本土源远流长的生态审美文化,借鉴西方生态批评的经验,结合生态美学而生发。”(袁鼎生,2013)而他所构建的审美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和谐美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为审美生态观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审美生态观亦需要服从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袁鼎生曾论及:“我是从接连地诠释实践美学、系统美学、和谐美学,然后创新生态美学的。没有对这三大美学的研习与诠释,我当无法具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就难以走出生态美学的创新之路。”(袁鼎生 & 付小月,2018)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生态批评所不可忽视的理论基础,影响着生态批评的理论走向。

如果说以上是中国生态批评有别于西方生态批评的现实背景,那么在中国学者借鉴西方生态批评时,很快就发现了西方生态批评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其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还不够稳固,更谈不上普适性。前文已经论及,深层生态学不足以成为真正可靠的理论基础。而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还有一种倾向,即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立论,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伦理关系。在袁鼎生看来,生态伦理学是西方生态批评的依据:“西方生态批评是一种生态功能性批评,并由此生发生态伦理文化质构。”(袁鼎生,2010)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论是西方最有代表性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之一,也为诸多生态批评学者所熟悉。他认为自然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因而也就天然拥有内在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2000,p.189)。内在价值以自然生命自身具有的目的性为标志,仅仅以它自身为尺度,是一种天赋价值。问题在于,离开人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目的,那么这一主张就是泛神论或万物有灵观的翻版;如果生态系统内在价值的成立无需自身目的为前提,那么价值就由一个关系范畴转变为实在范畴,这显然已经改写了价值的意义,变得不知所云了。”(王庆卫 & 李岚,2011)罗尔斯顿的自然内在价值论只是一种基于神学的幻想,与其说它揭示了自然物的存在意义,不如说是圣奥古斯丁所谓“哪怕在最小的生灵身上我们也能看到最大的奇迹”(奥古斯丁,2006,p.1142)的翻版。或许它能够适应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氛围,但不足以支撑中国生态批评。

其二是审美的缺位,这正是生态哲学上的不足所引起的后果。袁鼎生指出,格罗特费尔蒂将生态批评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称其“一只脚立于文学,另一只脚立于大地”,这是从生态关系的视角阐述文学的生态意义。但“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却因哲学方法的缘由,偏向于生态善的单一关系,离开了整一存在的美生站位”(袁鼎生,2021,p.241)。西方生态批评凸显了生态功能性要求,强化了生态伦理关系,这两方面固然表现出西方学者重建生态关系的努力,然而生态批评毕竟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忽视对审美价值的阐释或者不能将生态与审美辩证统一起来,把文学作品简单地当做生态学的史料,不但脱离了文学艺术欣赏的基础,也可能导向错误的结论。袁鼎生批评说,“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离开了价值本体的批评,实际上是游离于对象质域的批评。”(袁鼎生,2021,p.241)他不赞成这种单向单质的生态伦理批评,提出“倡导天然整一存在”的美生批评作为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袁鼎生以“美生批评”来弥补西方生态批评的这两方面局限。他说:“美生批评,在寻求、感悟、

体验、赏析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对其美生蕴含,作价值特征的判定、价值理想的体认、价值目标的肯定、价值规律的确认、价值原理的探究,以形成聚焦于美生的整一质域。”(袁鼎生,2021,p.242)美生批评的首要特征是倡导生态性与审美性的耦合,这种耦合性来自于袁鼎生所构建的审美生态观。2002年,袁教授在《审美生态学》中阐释了美学体系的历史演进与系统生成,初步建立了审美生态观的理论体系。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袁教授不断对审美生态观进行深化,直到在《美生学:生态美学元理论》中获得定型。他说:“何谓审美生态?答曰:整生与美生自然化和旋的结构,也是生存与审美的统一体。”(袁鼎生,2017,p.1)审美生态观的核心在于倡导审美与生态合一,生态与审美同生共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变必然会导致审美观念的流变。人的审美能力、审美倾向都在一定的生态关系中产生,又在新的生态关系中变化。总的看来,人类审美生态形成后,经历了古代主体向客体生成的审美依生范式、近代主体与客体存在对立关系的审美竞生范式、现代主客体耦合并生的审美共生范式、当代主客体在发展变化中互为主位的审美整生范式,并将趋向于未来的审美天生的范式(袁鼎生,2021,p.73)。简而言之,生态的即是美的,美必然体现出生态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也引动着人类审美意识的变迁。

审美生态观为袁鼎生的美生批评论提供了理论依托和审美理想。既然生态与审美同运,那么在进行文学和文化批评时,对文学作品审美特性的发掘本身就映射出其中的生态意识,而对其生态内蕴的揭示也体现出了审美品格。袁鼎生(2008)提出桂林景观生态具有“超循环有序、非线性平衡”的品质,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形态特征,同时也是一种美学特征。他从全州湘山寺的石涛刻画与纯道题匾中看出“端庄秀逸之美,传神写照之旨”,也称赞人与绘画、人与书法、画家与书家、艺术与文化都传达了主客体统一形态的中和神韵。他以自身的生态批评实践来说明,“生态批评的美化,特别是中国生态批评的美化,是一种本然的趋向,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袁鼎生,2010)。

通过审美生态观解决了生态和审美的统一问题之后,袁鼎生特别指出了美生批评的标准问题:“文学艺术的生态批评,是依据生态和谐特别是生态中和的评判标准”。如果说“和谐”还是为中西方美学理论所共有,那么“中和”就纯乎是一个源自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范畴。在故宫中和殿悬挂有“允执厥中”的牌匾,此语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两千多年以来,儒家学者始终倡导以“中”为行为法则,明代方孝儒《夷齐》说:“圣人之道,中而已矣”。表现各种对立因素之统一的“和”亦屡见于先秦典籍。《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礼记·郊特牲》:“阴阳和而万物得。”“中和”一词则见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曾繁仁(2013)提出,《中庸》将“中和”提到“大本”与“大道”的高度,而这种“中和论”哲学在中国古代影响甚大,他将中国古代美学总结为“一种‘生生’为其核心、以‘天人之和’、‘阴阳相生’为其背景的‘中和论生态与生命美学’”。袁鼎生则根据中国先秦美学中对“和”的阐述,结合审美生态观的理论特质,将具有中国血脉的“中和”融入生态批评中。2010年时,他提出生态中和构成了生态批评的最高标准,认为生态批评的目标就是“在现实时空中,合规律合目的地恢复和发展生态中和”(袁鼎生,2010)。他把“生态中和”定义为“生命与生境对生所形成的生态平衡性与生态整一性”(袁鼎生,2018),强调其作为各种生态要素的辩证统一,表现为动态平衡之美。由于“生态中和”融合了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等多重价值,因此它也表现为审美生态观中的理想状态,呈现了美生的宗旨。

四、美生批评的整一质域

袁鼎生的美生批评理论以审美生态观为基础,以生态中和为最高标准,追求审美与生态的同运,这些都可以看作袁鼎生对美生批评之“整一化”的强调。“整一”是袁鼎生生态美学理论的核心。袁鼎生认为生态美学的逻辑发展历程是从共生走向整生,臻于天然整生,归于美生。美生批评基于整生哲学,倡导“敞开整一的批评空间”(袁鼎生,2021,p.240),这是美生批评的本质特征。

所谓“整一”,首先表现为美生批评对生态与审美二者的融合,这是由袁鼎生倡导的审美生态观决定的。在审美生态观看来,生态的也就是美的,美的必然表现出生态和谐的内蕴,因此美生批评就以这种方式实现生态性和审美性的考察。如果说西方生态批评作为一种功能性批评、伦理性批评而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那么美生批评所关注的就是人与自然实现更高层级的生态中和之后的审美化生存。换句话说,共生已经不足以成为美生批评的目标,美生批评以更有本质性也更有审美性的整生性和谐为标准,追求

在“天籁家园”中的“审美天生”，抵达生态存在与诗意栖居的同一。

其次，既然美生批评以整生性和谐即生态中和为高位标准，那么支撑美生批评的哲学基础也就不应作为共生哲学的主体间性哲学或深层生态学。袁鼎生认为这两种在生态批评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理论只是生态哲学的初级形态，是主张共生价值的哲学，“西方的生态批评在这两种哲学基座上生发，空间的整一性疆界也由其规定”（袁鼎生,2021,p.244）。这样的初级生态哲学在竞生性和谐向共生性和谐转化的过程中曾经发挥巨大作用，但袁鼎生认为当代已经超过了共生性和谐的要求，自然整生论哲学即整生哲学才是美生批评的哲学基础。所谓自然整生论哲学，就是建立在“大自然的自旋生”这一基本的天文学法则之上的哲学，将宇宙从奇点开始膨胀、自然自我演进与自我调节、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作为理论基础。在这样的哲学基础指引下，袁鼎生的美生批评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天成之美的倾向。作为受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生态美学理论，美生学承认人的实践的必要性，但其理论出发点却是宇宙运行法则的无可变易，这也影响了美生批评的基本态度。

再次，美生批评具有整一性，也表现在袁鼎生将其视为四重境界的合一。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往往把英国浪漫主义、美国自然写作中的文学作品作为生态批评文本分析的对象，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生态批评应该是一种关注生态问题的文化批评而不仅限于文本，它表现生态危机时代的文化反思，以文学批评为主体，但又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袁鼎生则认为西方的生态批评集中于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三个方面，属于共生批评范式，还应该向更高的范式发展。2010年时，他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认为，生态批评是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这样生态批评就以文学艺术活动为范围，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质域。十年之后，他对美生批评的领域进行了拓展，指出美生批评的质域应该是四位一体的：“第一个层次是生态文学与艺术；第二个层次是生态审美文化；第三个层次是生态审美文明；第四个层次是生态艺术哲学。”（袁鼎生 & 太琼娥,2021）美生批评不仅仅局限在文学艺术活动的范围之内，它是文学批评与生态学批评、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乃至文明批评的结合，并深入到作为美生批评高端境界的哲学批评，这四个不同层次共同显示出美生批评的系统价值与整体功能。袁鼎生又认为这四重境界对应着四种不同的生态和谐状态，第一个层次形成了艺术文本的对生之和，第二个层次实现更高境界的审美文化的共生之和；第三个层次生发了生态审美文明的整一之和；第四个层次构建生态艺术哲学的整生之和。这四重境界“依次承续，递进超越，更是完发了和谐的美生”，表现出美生批评的递进性与开放性（袁鼎生,2021,p.242）。

最后，美生批评对整一性的强调，也体现在美生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法，它还是构建绿色审美人生与绿色艺术世界的一个环节。要实现人类整体和世界整体、生态存在与诗意栖居相统一的美生境界，形成天籁美生场的最终审美理想，就要完成“生态世界——生态文学——绿色欣赏——美生批评——美生研究——美生培育——天籁美生世界”的整一格局。美生批评是这个整一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接绿色欣赏，下启美生研究。美生批评是审美欣赏的成熟形态，也是理论研究的应用层次，它是从具体提升到一般的中间层，是达到天籁美生这个最终理想的关键步骤。这样美生批评就以其对生态意识、审美意识的养成与深化而参与到美生世界超循环生发的整体格局之中。

在袁鼎生看来，西方的生态伦理批评有走向美生批评的前景，美生批评是未来的生态批评，是生态批评的转型升级。在他的美生批评论中，无论文学领域与非文学领域，生态艺术、生态审美文化乃至生态文明都是美生批评的对象，几乎覆盖了人类文明的所有内容。美生批评不仅仅考察生态审美价值，还兼顾生态功利价值、生态伦理价值、生态认知价值，不同的价值统成美生，倡导科学性、生态性、艺术性“三位一体”。他以超越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共生之美的天然美生作为目标，认为自然化整生与天籁化栖息可以在美生世界中达到同构。在这样一种宏大的体系中，他提出生态批评的本质和功能在于“是品鉴、评判、肯定、弘扬生态文学的美生价值和价值规律，力主实现这种价值，呼唤社会遵循这种价值规律，进行相应的价值创造”（袁鼎生,2010），这是他对注重功能性的西方共生批评范式的超越。

五、结语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生态批评获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里收录了超过两千篇以“生态批评”为篇名的文献。但马治军在2012年指出，“中国生态文学批评还存在精神资源

的庞杂和批评话语的空泛、哲学根基的薄弱和终极追问的乏力、批评方法的单调和切入路径的因袭、文本细读的不足和审美体验的隔膜、典型文本的稀缺和批评视野的狭窄、批评主流的漠视与批评力量的不足等问题。”（马治军,2012）这些问题在当下仍然存在。无论是批评理论的匮乏、批评方式的单一还是批评标准的混乱，都严重影响中国当代生态批评的广度和深度。

在此情况下，袁鼎生的美生批评论建构了以整一存在为尺度、走向自然美生、以天籁美生为最高目标的理论体系，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种有启发意义的参照。一方面，他借鉴、利用了西方生态批评的成果，肯定了其在引导大众生态意识上的杰出贡献，也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作为功能性批评而忽视了审美性、作为共生性批评而缺乏整一性的弱点，而生态批评应该突出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历史标准和逻辑标准的耦合整生性；另一方面，他倡导中国气派的生态批评，认为审美是生态批评的本质要求，结合中国古代的中和观念而提出以生态和谐、生态中和作为生态批评的标准，将天人整生作为生态批评的最高理想，这样中国生态批评就“成了一种自觉的生态审美文化内需，而不是一种外来的被动的文化影响。”（袁鼎生,2013）

美生批评论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其理论体系极其宏大，几乎将所有人类文明都纳于生态批评的视野之内，这固然是其审美生态观、整生哲学所推导出的必然结果，却略显理想化而难以操作，其“天人整生”的理想也与当下的生态现实相距太远。不过作为一种有鲜明中国色彩的生态批评理论，美生批评论所建立的理论构架，所提出的范式、原则、目标，对于生态批评研究是相当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鼎生提出了“美生批评应当具有建设性”的观点，他说“我的生态美学研究是建设性的，虽也关注工业文明与竞生文化造就的生态灾难与生态危机，但认为这是人类文明非线性发展的必然，也就更着眼于生态文明的进步，牵引生态美学范式与范畴发展的探求，而没有像生态批评那样，专注对文化遗产负面效应的批判。这种努力，显然是历史规律与时代文明共同促成的。”（袁鼎生,2018）他的美生批评论恰恰是这种“建设性的生态批评”的反映。建设性而非对抗性的态度是进行生态欣赏、生态批评、生态研究所应有，这需要成为当代生态批评理论建设和实践的共识。

参考文献

- 奥古斯丁.(2006).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
- 程虹.(2000).自然与心灵的交融(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郇庆治.(2021).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泰山出版社.
-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2000).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
- 劳伦斯·布伊尔.(2010).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蓓.(2005).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
- 刘蓓.(2008).跨学科视野的生态批评.江西社会科学,(04),23-26.
- 马治军.(2012).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偏误与修正.当代文坛,(05),53-58.
- 司空草.(1999).文学的生态学批评.外国文学评论,(04),134-135.
- 斯科特·斯洛维克.(2010).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霄.(2013).“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梭罗的宗教观及其《瓦尔登湖》.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1),118-124.
- 王莉娜,&侯怡.(2020).生态批评: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6),114-119.
- 王宁.(2009).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03),5-12.

- 王诺 . (2002). 生态批评: 发展与渊源 . 文艺研究 , (03), 48 - 55.
- 王庆卫 , & 李岚 . (2011). 试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批评走向的理论意义 .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38(03), 21 - 27.
- 杨通进 . (2007). 环境伦理全球话语中国视野 . 重庆出版社 .
- 袁鼎生 . (2008). 超循环有序非线性平衡——桂林山水景观生态分析 . 社会科学家 , (10), 12 - 17.
- 袁鼎生 . (2010). 生态批评的规范 . 文学评论 , (02), 25 - 29.
- 袁鼎生 . (2010). 石涛刻画与纯道题匾的生态批评 . 中国文化研究 , (01), 124 - 128.
- 袁鼎生 . (2013). 生态批评的中国机理 . 鄱阳湖学刊 , (03), 78 - 84.
- 袁鼎生 . (2017). 天生论美学 . 科学出版社 .
- 袁鼎生 . (2018). 生态中和的形成与发展 . 中国美学 , (01), 233 - 244.
- 袁鼎生 . (2021). 美生学: 生态美学元理论 . 人民出版社 .
- 袁鼎生 , & 付小月 . (2018). 生态美学理论与方法的元创性追求——袁鼎生教授访谈录 . 鄱阳湖学刊 , (05), 27 - 34, 125.
- 袁鼎生 , & 太琼娥 . (2021). 美生批评论 .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43(04), 138 - 143.
- 曾繁仁 . (2013). 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 . 中国文化研究 , (01), 66 - 71.

作者简介

杨东, 博士, 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生态文艺学, 岭南文学与文化。

致谢

本文系 2023 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代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项目编号 2023WTSCX141) 的阶段性成果。